

青少年读书俱乐部推荐图书

文仲编

1966年的故事

百年历史回眸

陕西旅游出版社



青少年读书俱乐部推荐图书

百年历史回眸

陕西旅游出版社

目 录

联合国成立开发计划署	(1)
印巴签署《塔什干宣言》	(1)
“二月兵变”纯系讹传	(5)
江青开始进入政治舞台	(8)
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	(10)
人民日报文章点名批判夏衍	(13)
戴高乐的大举措:退出北约	(15)
印尼排华浪潮愈演愈烈	(18)
戚本禹攻击吴晗	(20)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20)
轰动全国的“三家村”冤案	(23)
中共发表《五·一六通知》	(26)
“文化大革命”始末	(30)
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	(33)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	(36)

中国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件	(40)
“二炮”在京成立	(44)
毛泽东与刘少奇对“文革”态度相左	(46)
“老子英雄儿好汉”	(49)
中央决定组建工程兵	(52)
毫无根据的“刘邓司令部”提法	(53)
红卫兵受到毛泽东首次接见	(56)
全国兴起狂热的个人崇拜	(59)
全国出现大串联高潮	(63)
周恩来极力号召抓生产	(69)
“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布满北京	(71)
世界第一座合成苯车间在上海建成	(73)
中国成功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	(74)
亚洲开发银行正式宣告建立	(75)
吴丹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76)
卓别林影片《香港女伯爵》	(80)
英·甘地当选印度新总理	(82)
美国来信	(84)
父亲的旧友	(86)

对孙冶方的批判	(89)
“向旧世界宣战”	(91)
老舍去世	(96)
几位著名人士在抄家运动中	(101)
遇罗克与《出身论》	(102)
周恩来与陈毅在 1966 年	(107)
红卫兵的“纠察队”	(111)



联合国成立开发计划署

1966年1月1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成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的一个多边技术援助机构。它的前身是联合国技术援助扩大方案署和联合国特别基金会,1965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这两个组织合并组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并于1966年1月1日正式成立。该署成立的主要任务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吸收开发资金、训练技术人员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生产效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领导机构是管理委员会,由48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还设有财政预算委员会、政府间补充开支工作组等辅助机构。它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向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其援助范围十分广泛,从资源的勘探、矿藏的开发,到农、林、牧、渔、工、交各业以及文教、卫生、科研、公用事业等领域。开发计划署的所有援助都是无偿赠予,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靠各国捐赠。

印巴签署《塔什干宣言》

1966年1月4日,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主持下,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

~~~~~ 1966 年的故事 ★

苏联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举行了会谈，并于1月9日深夜，双方达成协议，签署了一项“联合宣言”，这就是印巴关系史上著名的《塔什干宣言》。

印巴第二次战争爆发以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于1965年9月4日分别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及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信中说，印巴“应按联合国宪章和万隆会议精神进行协商以和平解决两国间出现的分歧”，并倡议双方在苏联的塔什干进行会谈。苏联这一倡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说，“苏联人正好在中国人的周围建立一道遏制中国的墙”，“举行塔什干会议的部分原因就在这里，这件事干得好”。

印度认为，它与苏联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苏联不会做有损于印度的事情。而且印度国内面临干旱，粮荒严重，经济情况恶化，政局不稳，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又面临两线作战的威胁，需要缓和一下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而印度在柯西金提出倡议之后，立即表示接受。

巴基斯坦鉴于苏联长期偏向印度，敌视巴基斯坦，对柯西金倡议存有疑虑。但由于巴基斯坦在与印度作战之后，暴露了军事后备空虚、难以与印度长期作战的弱点，加以美国在印巴开战后中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国内经济困难加剧。因而巴基斯坦在经过一阵犹豫之后，也勉强接受了柯西金的提议。

1966年1月4日，双方在柯西金的主持下在塔什干举行了会谈。苏联代表团除团长柯西金以外，还包括国防



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重要人物。在会谈中，印巴双方针锋相对，分歧很大。

印度在会谈中认为克什米尔已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拒绝与阿尤布·汗讨论这一问题，而且极力说服阿尤布·汗同意与印度签署一非战条约，强调要得到和平，两国应就不使用武力达成协议。印度还希望能有效地停火、撤军并使两国军队脱离接触，两国恢复外交、文化和贸易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

巴基斯坦一开始就坚持要将克什米尔问题列入会议议程，强调停火应与克什米尔问题联系起来。巴基斯坦认为，克什米尔纠纷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冲突的根本原因，只有在克什米尔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巴基斯坦才与印度签订非战条约。阿尤布·汗提出，塔什干会谈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双方能否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协议。

会谈持续一周，双方各持己见，拒不让步，已完全陷入僵局，甚至连会议议程都未达成协议。会谈结束的前一天，印度建议发表一联合公报，概以各方自认为重要的观点。巴基斯坦认为无此必要。这时两国舆论普遍认为，印巴首脑会谈将以失败告终。

苏联不愿意这一会议失败，柯西金在最后一天内“穿梭般地”往返于夏斯特里与阿尤布·汗之间。在柯西金的斡旋下，1月9日深夜，印度和巴基斯坦终于达成协议，签署了一项“联合宣言”，这就是印巴关系史上著名的《塔什干宣言》。

宣言是印巴相互妥协的产物。主要内容有：(1)双方

1966 年的故事★

一致同意执行 1965 年 9 月 20 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 1966 年 2 月 25 日以前,将“两国所有武装力量撤至双方的 1965 年 8 月 5 日以前驻扎的阵地”,并“遵守停火”。

(2) 双方都承认,印巴关系继续紧张下去,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双方将逐步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停止敌对宣传,遣返战俘,并恢复贸易和交通关系。(3)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在不损害其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同意宣言写上“讨论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但只是“双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4) 在非战条约问题上,巴基斯坦同意宣言写上“根据联合国宪章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互不干涉内政”。(5) 双方同意继续举行最高级和其他级别会谈,并成立一个没有明确职权范围的“印巴联合机构”。

《塔什干宣言》发表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宣言“将为南亚这个亚洲最重要的地区的和平奠定真正的基础”。美国总统约翰逊、英国首相威尔逊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等纷纷发表谈话,对宣言表示赞许。

印度对宣言表示满意。总理夏斯特里说,《塔什干宣言》是“十分明显的成果”,是“朝恢复印巴真正和平关系的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步骤”。印度认为,宣言谴责使用暴力,提倡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包含了印度早先提出的“非战条约”中的主要内容,是印度的胜利。

巴基斯坦的反应比较复杂。宣言对巴基斯坦虽也有有利的一面:如宣言签署后,巴苏关系有所改善,两国领导人互访,苏答应向巴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 8.75 亿卢比

的贷款；美国也恢复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但总的说来，宣言对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没有起推动作用。巴基斯坦政府对宣言予以低调处理。阿尤布·汗从塔什干回到巴基斯坦以后，政府发言人只笼统地说，宣言“既不是巴基斯坦的胜利，也不是印度的胜利”，而是“理智的胜利”。巴各阶层人民则对宣言普遍表示强烈不满。宣言发表后，卡拉奇、拉合尔和木尔坦等大城市的人民群众连续举行反对《塔什干宣言》的抗议示威。反对党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宣言是“一纸辱国文件”，说“允诺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实际上就是接受了印度提出的非战条约”，指责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已屈服于印度”。

但是，由于《塔什干宣言》没有解决印巴之间的根本分歧——克什米尔问题，双方对宣言中所提出的诸如成立印巴“联合机构”是否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设；宣言中所提“不干涉内政”是否适用于克什米尔问题；以及“撤退所有武装力量”是否包括“克什米尔自由战士”等等，都各作各的解释。此外，宣言在涉及驱逐难民等问题时说得比较含糊，实行起来也是各行其是。在60年代下半期，印巴关系一直未能实现正常化。

“二月兵变”纯系讹传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1966年7月前后，在北京市民中流传着一个所谓彭真、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

惊人消息。一时间，这个消息不胫而走，闹得满城风雨，并且逐渐传向全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而捏造的谣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因大学不同意，而没有借成。7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大字报揭发此事，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有人要搞兵变。北京师范大学有人把这张大字报转抄到北师大张贴。当时担任驻北师大工作组负责人的孙友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挑拨”，是“要制造流血”，在大会上加以批驳。康生知道此事后大为恼火。1966年7月27日，康生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不经任何调查，就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蛊惑人心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他污蔑孙友余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是在替彭真辩护”。8月4日，康生又到北京大学讲话。他再次强调所谓“二月兵变”确有其事。他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经过当时身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及其党羽们的大肆宣扬，本来不存在的“二月兵变”，似乎确有其事了，并一时欺骗了不少人。

康生捏造“二月兵变”，开始是为了打倒彭真，后来又



一箭多用，转而用来打倒贺龙。1966年夏，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放风，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委阴谋组织政变队伍”。1968年4月27日，康生对中央专案办公室的人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贺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700条”。1968年5月24日，他又对专案人员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在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进一步无中生有地陷害贺龙。在康生这样信口雌黄的诬陷之下，许多同志遭到株连和迫害。贺龙被专案审查，重要罪名之一就是策划搞“二月兵变”。

现在，事实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康生用捏造所谓“二月兵变”的卑劣手法来陷害彭真、贺龙，已经成为他的罪状之一。1974年由周恩来主持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就已指出：“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还难于点明问题的实质。1980年，党中央再次发出正式文件，为贺龙彻底平反。其中明确指出：“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捏造的谣言。”

江青开始进入政治舞台

2月2日至2月20日，江青受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江青邀请在部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到会座谈，并参与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纪要》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处，陈伯达提了两条意见：1. 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讲清它是30年代文艺黑线的继续和发展。2. 要讲一段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在听了陈伯达所提出的意见之后，江青又决定将《纪要》交给陈伯达修改。经修改后的《纪要》完全抹杀解放以后文艺界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纪要》说文艺作品中“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提出“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还专门用一个标题赞扬了“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列举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



浜》”等，并把这些文艺作品作为“革命的样板戏”。

3月22日，林彪就《纪要》写信给中央军委常委。林彪说：《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并报中央和毛泽东审批。

4月10日，正当中央书记处开会，批评彭真的时候，中央批发了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过的《纪要》。《纪要》的第一部分，专门介绍了江青在这次座谈会期间的各项活动，并称赞说：“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

对于江青来说，《纪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第一次向全军、全党和全国表明，在江青精心培育下的“革命现代京剧”代表了文艺的新方向。而且，《纪要》既然提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那么，江青就应当是“旗手”，果然，在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中，宣布撤销彭真、陆定一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江青即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这样，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开始真正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

1966 年 2 月 3 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制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简称。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指导学术讨论的文件。

1966 年 1 月 23 日，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彭真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64 年设立的五人小组（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及彭真组成）的组长，看到这个《汇报提纲》以后，也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用以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给学术界带来的不良影响及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

在搜集了解放以来许多次学术批判材料的基础上，2 月 3 日，彭真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大部分与会者赞同彭真所说的，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同时表示，对于学术讨论，要强调



“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还特别述说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指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只有康生“力排众议”，坚持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的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提出了当前学术批判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学术批判的形势、任务、方针、队伍、标准以及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等。《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提纲》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让不同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提纲》提出，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知识分子，孤立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虽然有错误的提法，但主要是为了把已经展开的艺术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提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极“左”偏差。

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汇报提

1966 年的故事★

纲》进行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均表示同意。决定按照《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经彭真再次修改后的《汇报提纲》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正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与陆定一和康生等去武汉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到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

3月17日至3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二月提纲》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和批判。他说：“‘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